

摘要

「竹林七賢」圖像為六朝時期流行的人物畫主題。人物畫於此期得到特殊的發展，建立其在人物畫史中的典範地位，而且發展的過程中，士族階層的貢獻最大。〈竹林七賢〉的風格、主題與作者，均與士族階層關係密切，故本文以此圖為基點，作為研究六朝士族藝術活動的具體個案。藝術評論與賞鑑活動，為六朝「藝術自覺」新發展的關鍵性因素，就顧愷之與戴逵的創作過程來看，當時士族品評之公論，對其影響甚大。畫者以圖像傳達品評的看法，士族也以品評人物的方式來鑑賞圖畫。這種創作與賞鑑之間往來頻繁、互補互動的關係，對於人物畫風格與畫評語彙的建立，產生深遠的影響。〈七賢圖〉風格上所見的共通表現模式，如頭部、五官、手勢，以及表所產生的「骨幹」效果，本文藉以檢討畫論中「骨」與「神」兩種概念的內涵。圖像意義的改變為歷史變遷的常態，然而〈七賢圖〉與其它圖像相較，顯然更具有變異的潛力。南朝時期〈七賢圖〉進入皇室後，意義隨之改變，原本建立在士族文化中，由士族文化中所滋長而成的品鑑標準與審美觀，並未能在黃皇室中生根，結果鑑賞的過程也就失去了中要性。〈七賢圖〉形式本身的價值，即作為藝術品的美感被忽視，只是單純地強調畫題的功能性。如何提升社會地位，才是皇室關心的重點。就皇室的藝術功能觀及其理解畫作的方式，與傳統鑒戒圖像並無二致。〈七賢圖〉作為死後升仙圖像的一環，為七賢圖像意義進一步的擴張，並且與傳統的升仙圖像有很大的差別。最大的差別在於竹林七賢，能夠同時具備生前與死後所要追求兩種價值。由於七賢生前在士族文化中的地位，廣受景仰，成為現實世界中最高的理想人物。另一方面，七賢生前對超越塵世、追求永恆生命的嚮往，配合後人進一步的理想化，七賢也兼具神仙的身份。生與死的價值於是相互貫通、互為補充。〈七賢圖〉的主題與風格的完成，為北方僑姓士族與南方吳姓士族共同合作的結果，為東晉南渡之後，南北士族文化相互交融的產物。